

李大钊、瞿秋白受邀来如小考

□彭伟

1923年7月26日,《时报》刊出一则有关如皋的重要新闻《组织暑期讲演会》:

如皋学界各团体及旅外学生,因利用暑期光阴起见,特于日前共同协议,组织暑期讲演会,经费由地方公款补助。现已筹备就绪,并特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东南大学杨杏佛二氏,莅如讲演,闻已得二氏同意,将于八月十五日开始讲演云。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杨杏佛是著名社会活动家、经济管理学家。如皋籍统战名人李恂成为李大钊的学生,已是1924年的事(《季恺纪念文集》第12页)。不过早在1919年,如皋籍学子魏建功、东台籍学子缪金源,已经考入北大。是不是魏建功代请李大钊莅如,尚无记录可寻。《组织暑期讲演会》只是“闻”得消息。查阅相关史料,李大钊最终应和如皋缘悭一面。

《李大钊年谱长篇》记述,1923年6月下旬,李大钊抵达上海。7月7日,他转去苏州,随后出席蔡元培的婚礼。中旬,他已在广州,又返回北京。8月,未

有相关记录,仍居北京。苏州与如皋一江之隔,可惜李大钊又有广州之行,未能来如演讲。

《如皋教育近讯》(刊于1923年8月30日《时事新报·学灯》)介绍,邀请方如皋暑期讲演会,由如皋平民社、如皋教育合作举办,期限三周时间:8月4日至24日。讲师有周铭三、刘儒、钱希乃、朱定钧等,听众为小学老师,共计300多人,所授课程有《国语教学法》《设计教学法》《教育统计法》《儿童学》等等。同期,暑期讲演会会员,还成立了两个团体——教育独立促进会、如皋小学教员联合会。恰巧,此次暑期讲演会还与第一届如皋平民社年会在时间上“撞车”。吴亚鲁、魏建功、吴俊升、范用余等会员从南京、北京等外地高校回到如皋出席年会。起初平民社想借宿如师校舍,因为暑期讲演会安排在如师活动,只能借用如师附小校舍举办年会(1923年11月1日《平民声·本社年会纪事》)。应邀出席暑期讲演会的讲师——江都曹守一先生还出席了平民社第一届年会,并发表演讲。

暑期讲演会又名暑期讲习会。随后

多年,如皋未曾独立举办相关活动,而是组织小学老师前往南通,参加南通讲习会的培训活动。尽管李大钊来如未果,不过那年此会还邀请过其他红色名人。1923年8月12日,《国民日报》刊出《上海大学之近况》,《申报》刊出《学务汇志·上海大学设国文系及讲学》。后文有关如皋内容更为翔实,兹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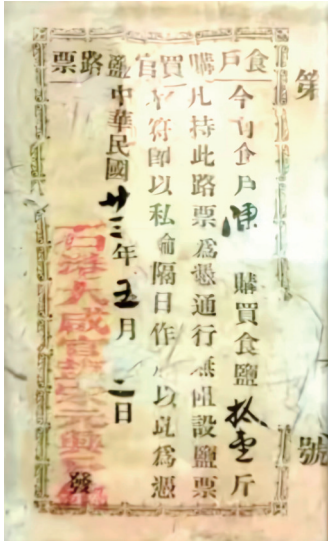
闻北青岛路上海大学,新设中国文学系以应时代需要,本学期共办一二年级两期,已聘定陈望道为主任,兼授修辞学、美学、语法、文学法等,沈仲九教授中国文学史及选文(语体),沈雁冰教授西洋文学史,叶楚傖、邵力子教授历代著名文选(包含群经诸子及史传),俞平伯教授诗歌、小说、戏剧,田汉教授文学概论及西洋戏剧,高冠吾教授文字学,李仲乾教授金石学。其英语及社会科学等,则由别系教授兼任。此外,尚有章太炎、褚理堂担任特别讲座。精神异常焕发,新学生除已投考录取者外,连日报名尤极踊跃。又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教授邵力子、陈望道,现被上虞白马湖暑期讲习会请去讲学;教务长瞿秋白、总务长邓安石,被如皋暑期讲习会请去讲学。

于、邵、陈已于昨晚动身,瞿、邓后日即须动身云。

上海大学素与如皋有缘。如皋人宋桂煌、葛克信,都就读于上海大学。1924年,正是吴亚鲁致信邓中夏等人,平民社员宋桂煌危难之际才被上海大学录取。邓安石就是名人邓中夏。所谓“后日即须动身”,即瞿秋白、邓中夏于8月15日前往如皋。至于两人是否如约来如,笔者未曾查到后续报道。

不过他俩是有可能顺路来如的。《瞿秋白年谱详编》《瞿秋白年谱》《邓中夏年谱》均有记载:1923年8月12日,瞿秋白在上海出席上海大学评议会第一次会议,会上确定邓中夏等人负责筹建新校舍。13日,邓中夏介绍刘华(宋桂煌室友)进入上海大学中学部。20日至25日,两人于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5日至19日,三年半谱未有相关记述。从上海前往南京,逆江而上,中途是要经过如皋地界的。

尽管无法确定瞿秋白、邓中夏是否来如,但邀请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杨杏佛演讲,可见不少如皋人彼时的思想还是很先进的。



市民黄忠杰近日捐出一份纸品,原物已揉成一团,破损不堪,几不能识,找裱工修复后,基本恢复原貌。兹录内容如下(文字空缺或无法辨识者,以□代替):

食户购买官盐路票(第 号)

今有食户陈□,购买食盐壹斤,凡持此路票为凭,通行无阻。设盐票不符,即以私论。隔日作废,以此为凭。

中華民國廿三年五月□日

石港大咸官盐宋元兴□□发

这张缮发于1934年的大咸官盐路票,长16.5cm、宽10cm,上印竖排黑色宋体字,并以图案围边,票式颇为精美。故纸虽小,字也不多,但其中的“路票”“大咸”等关键词,却承载着一段重要的南通盐业史实。

图左起:大咸盐栈原貌;在2008年火灾中幸存的大咸盐栈(不久后竟被夷为平地);修复后的大咸官盐路票。

一张大咸官盐路票,一段南通盐业历史

□姜松延

自古以来,食盐属国家严控物资,盐业专卖也是政府控制财源的方式之一。南通州一带因逼近场灶,城乡居民食盐一向不设官盐店铺,任由民众肩挑背负,小额贩运盐场灶丁余盐,相沿成俗。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两淮盐运司在通州及近场各县设官盐栈,一年后却因无利而罢。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与同仁集资收购吕四场李通源旧盐垣产业,创立同仁泰盐业公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们又通过与其关系密切的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端方,获得提高牌价、在近场开办食岸的权利,实际取得了通、如、海一带食盐销售的垄断权,并于是年十月成立了专门的销售机构——大咸盐栈(一名大咸公司)。

据载,淮南盐远销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统称“扬子四岸”,同时还行销于淮南食岸。淮南食岸分江宁、江浦等六县“外江食岸”及江都、南通、泰兴、盐城等15个“内河食岸”。外江、内河食岸的盐斤,由食商划分别承销,这种专卖性质的食商,在淮南计有八家,其中的大咸负责分销南通、如皋、海门三岸,每年行销数额约为100万担。

作为食岸运商,大咸除在通城设有总栈,另于如皋、海门县城及较大市镇设分栈。如设有金沙(1918)、四安(1920)等分栈,而乡区小市则由盐户认领代销。其中,各分支盐栈也将盐斤批发给盐户,由盐户设益或挑负零卖于乡村居民。

史载“石港居民,食盐多系小贩贩来,以其近于盐场故也。自(1917年)缉私营某船长到石后,对于职务异常认真,而小贩绝迹,居民几有淡食之

忧”。幸于当年夏天在石港“新开大咸分栈,始有接济”,随后“又添设盐户多家”。

淮南为产盐最旺之区。但随着“海势东迁,卤气渐消,产额锐减”,民国元年(1912),两淮盐政张謇以额盐无多而裁汰石港场,就近并归于吕四、掘港两场。此后,旧日产盐区域亦改营垦务,通属总场办公处也由石港移驻通城,“至岸商悉由大咸盐栈承办……每年销盐数目,通知两岸约八千九引”(按:每引盐重,规定不一。如清代曾“以六百斤为一引,外加卤耗六十斤,包索三斤半,每引分装八包”。另据1915年《淮鹺月报》载,“淮南场商收捆灶户之盐数以桶计,计重二百斤,旧制两桶一引”)。又据1919年报载,当年包括石港在内的东部“各大镇盐盆林立,常以小船赴城,向大咸盐栈贩盐而回。按日东大河内,莫不有此项船只来往也”。大咸营业之盛,可见一斑。

因通州海滨多盐场,盐产品取给方便。就味力而言,又有“广不如浙,浙不如淮”之说,亦见淮盐品质较好。故通州百姓吃盐是很有口福的。但自从大咸在市镇设立分栈后,官盐价格提高,导致私盐禁而不止。“私盐行,则官盐阻。”如1922年,“四安市大咸分栈因今年私贩充斥,官销停滞”。而石港官盐分栈则因“销数疲滞,呈请总栈停闭”。1926年9月,经瞿仰张等“以石港距离通城有六十里之遥,若无分栈,居户购盐,殊感不便,特筹集呈请总栈再行开设”后才重新开秤。

私盐盛行带来的不仅是官盐销售停滞,更重要的是导致盐税大幅减少。为此,历代政府都非常重视盐税征收。如1931年3月,淮南盐运副使以各场裁并,曾“就南通石港设立稽征

所,委任屈天璧为所长”。1933年,因时事多艰,地方不靖,“以致私盐充斥,官销无由起色,税收大受影响”。6月,南通县长叶震东会同扬州稽核分所税警第四区长邵少英,印发布告,劝谕“凡尔人民,所需食盐,务须各向就近销售官盐处所购买官盐,切勿贪图贱价,触犯法律”。

同时,各地还设有缉私机构,并加强驻防,以严厉打击贩售私盐者。以上世纪20年代为例,因南通一带“地域辽阔,私枭出没”,淮南缉私局曾派淮南缉私水一营常驻石港,该营“所属各连分驻南通、如皋、东台各市镇”。而担任营长并驻石港者,先后有刘肇麒(1927)、许慎修(1928)、耿朝柱(1928)及杨椿林、程雪飞(1929)、赵玉山(1929—1930)等人。

1931年3月,淮南缉私局委任熊伟夫为水兵大队附,统率水兵大队第三中队及陆兵第二大队第六中队驻防石港。随后,缉私局又于5月委派钟任石港淮南缉私水队队长。

为有效遏制私风滋蔓,当年还配套推行“路票”制度。这张“食户购买官盐路票”纸品,便是该制度的重要见证。1934年,财政部发布第7614号令,对淮南内河外江路票式样予以确认。同时,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发训令,明确路票期限仍照1931年8月该部之规定,即“城区以给票当日为限,六十里内以两日为限,六十里多至一百里以三日为限,一百里以外以四日为限,均连给票之日统计在内”。而抗战前《大公报》曾载“凡购官盐者,均须发给路票,购盐多寡、所行路程,均载票上,以便检查”,各地多按此规定执行。对比石港路票内容,则与此基本一致。

又据1937年《盐务汇刊》,当年“路票计分三种:第一种两联,专备总栈拨盐至分栈之用;第二种三联,专备盐户或酱园购盐之用;第三种两联,专备食户购盐之用”。而石港路票显为其中的食户购盐专用。但对照两淮盐务稽核机关1936年工作报告,当年所用路票,存在“各栈自刊,且未经盐务官厅盖用钤记”之情形。这张石港路票,似乎就属于此种情况。

再看该路票的落款,虽末尾两字无法确认(疑为“分益”),但“石港大咸官盐宋元兴”却清晰可见。查宋元兴,为石港著名商号之一,其主人宋海秋,曾任石北镇镇长,兼石港商会常委、石港花业公会常委、《声报》社副经理,后于1930年辞去上述职务,专任宋元兴花行经理。那时的食盐,除了官栈,还可向官盐购买。而路票上的钤印告诉我们,当年的宋元兴,除了经营花行,设益售盐,也是其业务之一。

的确,彼时的石港,除了大咸官盐分栈,还设有负责零售的官盐盐户若干。如1926年之石港“盐户,多至十余处”。但到1934年10月,第七区(石港)农会举行干事会议,讨论“各乡镇会迭呈请求转函大咸盐栈,准予普设分益,以维民食而免违法案”。议决结果为:“代电县党部、县政府、县农会,转咨扬州盐运署,迅令南通大咸盐栈,准予普设。”而这张路票开具于是年5月。由此可见,当时的宋元兴,应属石港为数不多的几家盐盆之一。

实物见证历史。时至今日,人们早已不知官盐路票为何物,甚至连《南通市盐业志》也不见“路票”一词。只有这张泛黄的纸片,穿越几十年的时空,依稀诉说着当年南通盐业管制的往事。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他要求的水平。他一生只带了一个徒弟,是本地人蒋学礼。胡时友除做手艺人,业余时间还喜欢喝茶、打牌、讲唠(意思即聊天)……他处事客观又公正、为人光明磊落,方圆几里哪家需要说家务事或是分家,往往会请他去说和或评理。

胡时友对不太满意的子孙们,也会道上一句“竹棒搅茅缸(糞池)——不能闻(文),不能舞(武)”。

胡时友吃饭有时还会拿出吴道愔送给他的象牙筷。孙子胡振结婚时用红地毯,胡时友感慨地对大家说,他在张謇家见过的红地毯比这个豪华多了。

《马路天使》海报(局部)



1937年赵丹与周璇主演《马路天使》

□任寿

1937年时,赵丹与周璇共同主演了电影《马路天使》。

赵丹,名凤翱,幼年时随父赵子超定居南通城内。少年时的赵丹就显示了艺术才华,读小学时即在游艺会上有出色表演,并参加通师学生剧团,对外公演。中学期间,与同学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周育海、梁志仁等组织小小剧社,演出《阎瑞生》《除夕》《小偷》《苏州夜话》《决心》等话剧,还在《枫叶》刊物上发表了其创作的剧本《衣衫之死》和《除夕》。

周璇,原名苏璞,出生于江苏常州。1931年,年仅11岁的周璇加入明月歌舞团,因演唱歌曲《民族之光》而受到关注。1932年,她在歌舞剧《特别快车》中担任主演,而由她演唱的歌曲《特别快车》亦被灌制成唱片,周璇也由此在歌坛崭露头角;同年,她还参演了救国进步歌剧《野玫瑰》的演出,终场时,其中一句歌词“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得到众人的好评,于是她改名为周璇。1934年她在上海《大晚报》举办的“广播歌星竞选”中获得亚军,1935年正式进入电影圈。1937年与赵丹、魏鹤龄等主演的剧情片《马路天使》成为其表演生涯的代表作。

《马路天使》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品,袁牧之执导,赵丹、周璇、魏鹤龄等主演。该片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都市生活为背景,讲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遭遇以及歌女小红与吹鼓手陈少平之间的爱情故事。

拍摄《马路天使》时,赵丹只有22岁,周璇只有17岁。周璇当时还没有谈过恋爱,于是导演要启发她怎么表达对男主角的喜欢。导演选中赵丹,是因为他有杰出的艺术才华;选中周璇,一方面是因为周璇的年纪与片中的角色相仿;另一方面是因为周璇的个性天真,符合片中角色的定位。

全面抗战开始后,赵丹参加上海抗日救亡宣传队演出三队,随军内迁,沿途坚持宣传演出,先抵武汉,再去四川。为追求进步和艺术深造,赵丹拟去苏联学习,经新疆时被留住工作。1938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囚禁。后来盛倒台才得以回重庆,继续艺术活动。

史海回眸

通海人民踊跃交售爱国棉

□李元冲

棉花曾是通海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其产棉史可以追溯到元末民初。到了清末由于大生纱厂的创办,进一步扩大了通海地区棉花的种植面积。直至20世纪末,棉花仍然是通海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乡镇企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乡镇工业和建筑业,同时由于新疆地区日照时间长,当地生产的棉花棉绒长、品质好、产量高,于是新疆地区的棉花种植业逐渐兴起,通海地区的棉花种植业逐渐萎缩。但当年通海地区农民积极交售爱国棉的情景,一直在我的眼前浮现。

1979年我因工作需要,调入了海门县德胜供销社,在那里工作了三年。那时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海门是重点植棉地区,棉花收购则为供销社的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据统计资料,1979—1982年是海门全县棉花的高产期,其中最高的一年是1979年,当年全县棉花总产量29115吨,其中供销社收购28079吨,占总产量的96.45%。德胜供销社是全县30个供销社之一,当年棉花收购量达到1000多吨,平均每天收购量都在10吨(棉花收购时间前后约2个月),最多的时候能达到30吨以上,长长的售棉队伍有几里之遥。1978年以前,农民交售棉花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一般是派几个年轻力壮的劳动力,用拖车、拖拉机运到供销社的棉花收购部,经取样、检验和计价后就算成交了,那时由于售棉的单位数少,供销社的工作量还不算太大。但1979年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交售棉花都是以户为单位,从生产队为单位变成以户为单位交售后,单位数大增。取样时需以户取样,往往一户有好几种不同的棉花(如光白花、杂质花、黄脚花),所以都要取样,这一项就增加了几十甚至上百倍工作量,取样后的每个样品检验时还需一段时间。供销社每天迎接着长长的售棉队伍,收购后的棉花还要按级打包过磅,然后装上船,由船户运往轧花厂,所以那段时间供销社每天工作时长达12个小时。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动员起来,除了必要的人员看守门面,其余基本都去参与棉花收购,协助专业的棉花收购人员进行取样、司磅、打包、指挥装卸工作以及进行秩序维持。每天最后一个售棉户离场后,大家还要结账核算、整理仓库、清洁场地等等,往往要忙到晚上12点钟。大家虽然非常疲劳,但一想到为农民群众解决了抢救的燃眉之急,都十分开心。

当时交售棉花除了供销社渠道外,还有私人收购的渠道(俗称“黑市收购”),价格要高于供销社收购的价格,并且是上门收购,但人民群众卖给他们的很少。1979年海门全县私人收购的棉花仅占总产量的3.55%(其中还包括部分社队企业收购)。那时政府也没有专门的打击黑市棉的执法队伍,全凭政府“积极销售爱国棉”“棉花是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等的宣传,人民群众满怀对党和国家的一腔热情,都很自觉地把棉花送到供销社,以支援国家建设。



胡时友(1905—1996),如东县双甸镇奎村19组人。他从小学做油漆匠,十五六岁在当地就小有名气。由于张謇家大业大,建厂、创办公益事业,需要大批建筑工人,油漆工一块也缺少人。而张謇夫人吴道愔老家正好在胡时友家北边一里多地的吴家庄,知道他的名声,就将胡时友带到张謇家做油漆工,当时是1920年前后。

胡时友在张家做油漆,工艺十分讲究。如给张若孝使用的桌椅,油漆时用生漆就要刷上十二三遍。料足工细,木不损、漆不掉,光滑、明亮、透红,很难褪

色。由于油漆工作量大,胡时友还将双甸南乡五里庙的漆匠张伯如带到张謇家一起做工。

吴道愔客气地称他为“胡师傅”,并将油漆工一班人委托给他安排管理。吴道愔喜欢打牌,空余时,胡时友还陪吴道愔打牌。

张家对工人也十分关心,梅兰芳到南通更俗剧院演戏时,张謇家特派黄包车送胡时友去看戏。胡时友回家探亲,只要张謇家的一张介绍信,坐船一路免费畅行。

在张謇家做工13年后,由于胡时友

妻子胡汤氏生有肺病,45岁就去世,为了照顾家老二子一女,加之住他家东北边的岔北大地主徐功余请胡时友去做油漆工,胡时友决定回家。

胡时友回乡后更加有名,方圆几十里都以请到他做油漆为荣。他给人家油漆的家具也是料足工细,尤其姑娘出嫁时的嫁妆,油漆得红彤彤,能够使用多年不褪色。胡时友写有一手好字,给人家临终时油漆棺材,写在瓜头(棺材大头)上的金字让大家十分赞赏。

胡时友对收徒要求十分严苛,怕徒弟打着他的旗号到人家做工却不能达到

张謇家的漆匠胡时友

□丁德全